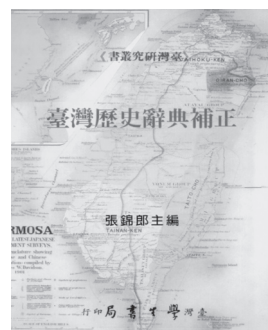


《臺灣學研究》  
第8期 頁171-178  
民國98年12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 台灣辭書評論的首開風氣之作 —張錦郎主編《台灣歷史辭典補正》評介\*

顧敏耀\*\*

書名：台灣歷史辭典補正  
編者：張錦郎  
出版社：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出版時間：2009年10月  
頁數：397頁



### 壹、前言：我國第一部辭書評論專書的誕生

筆者在2006年7月曾於《歷史月刊》第221期發表〈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詞條商榷：以王見川撰〈李炳南〉條為例〉（頁128-133），當時該辭典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已歷二年，拙文卻是第一篇評論文章，在〈李炳南〉這一則400餘字的詞條釋文中分析出16項問題，並於文末說道：「筆者認為，若對此書4,600多個詞條逐一進行這般推敲探究，非要撰成一部數百頁的專書不能蔽事」，沒想到在三年後的今天，確實出版了一本將近400頁的專書來評論這部重要辭典，這也是全國第一部辭書評論的專書，對於我國辭書／參考用書／工具書的研究而言，具有開創性與指標性的意義，若日後有台灣辭書研究史／台灣辭書學史（亦屬「台灣學」的涵蓋範疇）的撰寫，張錦郎主編《台灣歷史辭典補正》亦應具有一席之地，本文主要便從辭書學的角度切入並兼及其他學科面向進行評介。

該書主編者張錦郎教授（1937～）是國內知名的工具書與目錄學專家，由其領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建議，深感獲益良多，敬致謝忱。

\*\* 作者係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兼任講師

軍撰寫此書，的確十分合宜；其實，若以《台灣歷史辭典》之補正／評論作為學位論文題目，也是綽綽有餘而極具意義，只是那畢竟受限於一人之視野，而《台灣歷史辭典補正》則由教授率領研究生共同撰寫，集眾人的智慧而成，解析視角較為多元而全面（此種撰述方式在國內還有另一位林慶彰教授亦時常採用），不僅對於學生有鼓舞之效，也讓學術界得以認識與利用這些學界新血的研究成果。

我國戰後雖曾先後出版過不少人文方面的專科辭典，如龍倦飛（王雲五）編《中國史地辭典》（1959）、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1975）、韋政通編《中國哲學辭典》（1977）等<sup>1</sup>，不過，以台灣為主題者則要等到解嚴後才出現，諸如楊碧川編《台灣歷史辭典》（1997）、遠流台灣館編《台灣歷史小事典》（2000）等，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2004）不僅規模方面遠邁前者，而且又有網路版的推出，在影響層面而言也是前者難以企及，張錦郎研究團隊針對這本極具重要性的專科辭典進行評論／補正，就擇題方面來說也十分值得肯定。

《台灣歷史辭典補正》主要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有林芳如〈人物詞條補正〉、洪楷萱〈著作詞條補正〉、高淑芬〈期刊詞條補正〉以及林芳如〈插圖、圖說補正〉，中編有張晏瑞〈體例篇〉、范嘉倩〈輔文篇〉與張晏瑞〈版面設計篇〉，下編則是張錦郎〈校讀篇〉，書前有〈凡例〉，書後有〈參考文獻〉、附錄四篇以及〈後記〉一則，論述結構井然有序，切入角度面面俱到。

## 貳、優點之一：明察秋毫，窮纖入微

《台灣歷史辭典》的總策劃人是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包含她在內的詞條撰稿人共有141位，幾乎網羅了當前台灣文史學界的重要學者，各個都有扎實的學術涵養與歷練，要從中指出偏差甚至錯誤之處，談何容易？然而正如劉勰於《文心雕龍·指瑕》所說：「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誠然如是，《台灣歷史辭典補正》的作者群便透過仔細的閱讀爬梳、文獻史料的精確掌握與耐心的複查，從4656則詞條當中找出了多達331則有問題的詞條（根據該書附錄三〈失當詞條索引〉），背後所花費的苦工與精力著實令人感佩。

該書指出的許多事項都屬本質上的錯誤（即中國學界所謂「硬傷」），例如林芳如〈人物詞條補正〉所述：魏心怡撰〈江文也〉說他「1932年赴日」，實則

<sup>1</sup> 張錦郎編著，《中文參考用書指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頁410-488。

為1923年<sup>2</sup>；陳佳宏撰〈廖溫魁〉說他「曾將《左傳》譯為英文」，應為《韓非子》<sup>3</sup>，還有高淑芬〈期刊詞條補正〉找出的：《大地詩刊》、《皇冠》、《現代文學》的創刊日期與《文學界》與《作品》的停刊日期都有錯誤等。林芳如〈插圖、圖說補正〉也發現了一些嚴重的圖片誤植：薛化元撰〈台灣省臨時省議會〉附圖說明為「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成立大會會後合影」，其實該圖卻是「原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第一次聯歡會攝影紀念」；1931年成立的「台灣文藝作家協會」之配圖竟是1964年才創刊的《台灣文藝》書影。

有的僅僅一字之誤也被發現，例如張錦郎〈校讀篇〉指出：吳明勇撰〈李文後〉說李氏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部」，實則應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洪麗完撰〈岸裡文書〉提到曾出版此古文書的「台中縣文化中心」，應作「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歐素瑛撰〈梅貽琦〉提到的「華美協進會」乃「華美協進社」之誤等，堪稱明察秋毫，觀察入微。

## 參、優點之二：觀瀾索源，斧底抽薪

《台灣歷史辭典補正》也以確切的實例呈顯了撰寫工具書所應該注意的通則，例如在堪稱辭典主體的詞目釋文內容方面就有：不需重複詞頭、應有概括語、不能寫預定而尚未發生的事（如楊思偉撰〈教育部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說該會「未來預定和國家教育研究院合併」）、用詞應統一（如「訪華」與「訪台」）、不應該把人物介紹寫得像是年譜一樣（如許毓良撰〈高其倬〉幾乎每行都出現一次西元年代）、用字應以極度精簡而惜墨如金為要求（如黃美娥撰〈東西哲衡〉釋文首句便是「乃李春生所著」，「乃」與「所」都可刪去）、若詞條是著作則應以介紹內容為主而不應該花太多篇幅在介紹作者（如應鳳凰撰〈台灣人三部曲〉）或成書過程（如林玉茹撰〈台灣志略〉）、釋文長度應該要能夠反應詞目重要性等。

圖片方面亦有：不應在不同的詞條重複使用同一張圖片（如〈中國佛教會〉與〈李子寬〉、〈海東文獻初祖〉與〈沈光文〉、〈梁實秋〉與〈蔣復璁〉等）、人物肖像應以正面、半身的晚年獨照為主而不應該用側臉照（如〈林海音〉）、幼

<sup>2</sup> 筆者複查謝理法《台灣出土人物誌》（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之〈江文也——故土的呼喚〉（頁329）以及莊永明《台灣百人傳·2》（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之〈讓世界傾聽的台灣音樂家——江文也〉，確實如此。至於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2006）當中的郭啟傳撰〈江文也〉（頁108-109）則正確寫著「1923年赴日」。

<sup>3</sup> 筆者複查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紀錄《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之張炎憲撰〈廖文毅、台灣共和國與島內運動〉（頁4），確實應為「韓非子」。

年照（如〈洪炎秋〉）、全身照（如〈蘇雪林〉）或合照（如〈楊英風〉、〈雷震〉、〈羅斯福〉）等。

其他關於整體格式方面則有：辭典正文應該從第一頁開始（《台灣歷史辭典》第一個詞條的所在頁碼是第41頁）、詞條收錄標準應該明確而一致（例如對於行政院所轄的部會收錄了〈內政部〉與〈財政部〉兩個詞目，卻未見其他同級的單位，反而收錄了經濟部與交通局轄下的數個單位）、內容重疊性極高的詞條應該合併（如〈沈光文〉與〈海東文獻初祖〉）等。

這些都十分合情合理，讓人頗有茅塞頓開之感。此外，該書不僅清楚呈顯且描述了《台灣歷史辭典》所出現的諸多問題，還「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在表象之外進一步探究推敲何以會出現這些問題的深層因素，得出來的結論是：該書的詞條撰述者毫無疑問的都各有堅實的知識背景，但是「辭書學」本身就是一門專業領域，撰寫詞條需要用一種「辭書體」，與論文寫作絕不相類，學者們未必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因此，為免事後治絲益棼，在事前就應斧底抽薪的完成一部工作手冊作為指引。

張晏瑞〈試擬《台灣歷史辭典》編例〉（收為該書「附錄一」）便是此一工作手冊的試擬，分為「辭典架構」、「辭典釋文」、「編輯規格」以及「插圖」四大項，關於編纂辭書在各方面應該注意與遵守的要項都予以完整論述，立論中肯而切近實用。

因為「台灣學」的工具書目前仍有許多空缺之處（諸如台灣地理辭典<sup>4</sup>、台灣哲學辭典、台灣文學辭典<sup>5</sup>、台灣美術辭典、台灣醫學辭典、台灣心理學辭典、台灣社會學辭典<sup>6</sup>等，至今都尚未問世），亟需有志學者們陸續編纂，因此，《台灣歷史辭典補正》的內容不僅有助於《台灣歷史辭典》日後的增修改訂，也可作為其他專科辭典在未來編纂時的重要參考。

<sup>4</sup> 關於台灣地理的辭書方面以地名研究為主：伊能嘉矩《台灣舊地名辭書》（東京：日清印刷株式會社，1907）、陳正祥《台灣地名辭點》（台北：南天書局，1993）以及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一～卷廿一）》（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0）等。

<sup>5</sup> 目前僅完成「台灣文學辭典檢索系統」（網址為：<http://xdcn.nmtl.gov.tw:8090/>），尚未正式出版。

<sup>6</sup> 雖然尚未出版辭典，不過已有發展史的問世：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8）。

## 肆、評論與建議

作為一篇書評，筆者對於《台灣歷史辭典補正》亦有一些拙見，秉持著野人獻曝之忱，提出給作者參考。首先，該書所參考的辭書編纂論著幾乎都是中國學者所寫<sup>7</sup>，當然，中國在辭書撰述與研究方面有相當的成就，不止有評論辭書之刊物（即《辭書研究》），還有專門出版辭書的出版社（如「上海辭書出版社」）。不過，完全只利用到該國的研究成果是否合宜呢？筆者認為其他國家的研究成果應該若可以參考，應該會有一些不同的收穫，例如，張晏瑞〈體例篇〉依循楊祖希與徐慶凱合撰《專科辭典學》的分類，認為工具書可分為「辭典型」與「非辭典型」，「辭典型」又可分為「百科全書」與「辭典」，「辭典」之下還可再分為「語言符號辭典」以及「非語言符號辭典」，而「語言符號辭典」之下則有「專科辭典」以及「語文辭典」，而「台灣歷史辭典」的定位即屬此「專科辭典」。

其實，這並非唯一的分類方法，在編纂工具書的歷史與成就都不遜於中國的日本，一般稱工具書為「參考圖書」或以外來語「レファレンス・ブック」（Reference Book）稱之，可分為以下11類：辭典（或稱辭書）、事典、人名事典、地名事典、便覽、年表、圖鑑、年鑑、地圖帳、書誌以及其他<sup>8</sup>，若按此分類標準，則「台灣歷史辭典」的定位應屬「事典」類的「專門事典」，而這也可以說明另一部時常與《台灣歷史辭典》比較的同樣頗具重要性之台灣文史工具書《台灣文化事典》為何要以「事典」為名的來由。

西方稱「辭書學」為Lexicography（或譯為辭典學、辭典編纂學），已有多年累積的傑出研究成就，相關學者的著述亦多，新近出版者有Svensen Bo, *A Handbook of Lexicograph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ctionary-Ma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9)，較早出版而已經譯為漢語者有美國學者Sidney I. Landau《詞典編纂的藝術與技巧》（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法國學者Henri Bejoint《現代詞典學入門》（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等，這些同樣值得參考。

此外，《台灣歷史辭典補正》有些地方在指出問題之後，一針見血的揭示正確答案，但是也有許多只提出資料上的齟齬之處而沒有說明正確的答案為何，例如指出了劉士永撰〈馬偕〉的詞條後標明其逝世日期為「1901.1.4」，與釋文所寫

<sup>7</sup> 諸如：林玉山主編《辭書學概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陳炳迥《辭書編纂學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楊祖希與徐慶凱合撰《專科辭典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以及許多《辭書研究》所刊載的單篇論文等。

<sup>8</sup> 齋藤孝、佐野真、甲斐靜子，《文獻を採すための本》（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0），頁29-34。

「1901年6月2日馬偕博士因喉癌病逝淡水」不相符（頁31），不過卻沒有說明哪個才是正確的（其實是後者<sup>9</sup>）；也指出許雪姬撰〈莊垂勝〉的逝世日期標示為1962年10月12日，與《台灣文化事典》的莊惠惇撰〈莊垂勝〉詞條所記載的1962年10月13日差了一天（頁292），也未說明何者為是（後者才正確<sup>10</sup>）；同樣是許雪姬所撰的〈蔡培火〉，其詞目後面標示生卒年為「1889~1983.1.4」，但釋文中卻說他「於1982年過世」，因此，「前後矛盾，不知何者才對」（頁31，其實前者才是正確的<sup>11</sup>），諸如此類。的確，該書的寫作主旨在於指出《台灣歷史辭典》的問題所在，而不在進一步說明事實，不過，若能全部都指明正確答案，不僅能達成全書體例上的一致，對於讀者的了解真相而言也十分有益。

還有，在〈人物詞條補正〉之中摻雜了一些對楊碧川《台灣歷史辭典》（頁31）以及林昶乾等總編輯《台灣文化事典》的評論（頁41），已經逸出主題，應該改置註腳，以免混淆。至於〈期刊詞條補正〉，撰者自己試著撰寫了一些可增加的詞目，其中〈天下〉之釋文云：「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報導、分析與經濟生活相關的觀念、問題與政策。抱定『積極、前瞻、放眼天下』的理念，三位主事者以自己的傑出與膽略，開雜誌出版之風氣」云云，〈雄獅美術〉則說「『雄獅圖書公司』的圖書藉由《雄獅美術》之名暢銷，《雄獅美術》也因為這樣而保持水準，公司蒸蒸日上，是為出版界的一段佳話」，這些其實都未能完全符合該書〈試擬《台灣歷史辭典》編例〉在〈釋義原則〉所說的需用中性客觀語句而避免頌揚太過的原則。

最後，書後的〈附錄三：失當詞條索引〉讓讀者使用這本《台灣歷史辭典補正》得以更加便利，只是其中標註的「本書頁碼」有許多都與實際頁碼不符，例如表列的第一個詞條「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標示的「本書頁碼」是頁271，其實是在頁269（多了3頁），「西川滿」說是在頁280，其實是在頁278（多了2頁），有此情況者不在少數，這可能是在出版流程的後期編頁過程中所出現的錯誤，若日後有再版應可更正。

<sup>9</sup> 鄭仰恩，〈台灣的「黑鬚蕃」：馬偕其人其事〉，馬偕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2007），頁329；董芳苑，〈馬偕〉，林昶乾等總編輯，《台灣文化事典》（台北：台灣師範大學人文中心，2004），頁635。

<sup>10</sup> 莊垂勝哲嗣林莊生於其所撰《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台北：自立晚報，1992）附有一則〈莊垂勝先生簡歷〉，便清楚寫著「十月十三日去世」（頁114）。

<sup>11</sup> 賴淳彥，《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9），頁176；謝德錫，〈變局下的柔性政治家——蔡培火〉，張炎憲等編，《台灣近代名人誌》（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105。

## 伍、小結

總而言之，《台灣歷史辭典補正》對於該辭典在日後的增修、未來台灣專科辭典的編纂、促進國內的專書評論風氣等諸多方面而言，都具有正面而積極的效益，瑕不掩瑜，成果斐然，值得一讀。從中也看到了我國自己的「辭書學」論述已經逐漸在成形，而國內辭書專家及其領導之團隊的功力更絲毫不遜於海峽對岸。

近年來「台灣學」的研究頗為蓬勃發展，當然與學術環境的自由開放、主政者的重視、相關研究單位（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的「台灣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的台灣史研究所等）與系所（如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以及台灣文學系所等）之成立等外在因素有密切相關，不過，許多學者的用心投入更是這一學門不斷往前推進的重要助力，學者們陸續編成的工具書便造福了許多有志於此的研究者以及有興趣的一般社會大眾，除了《台灣歷史辭典》之外，還有《中華民國文學年鑑》（1980、1982）、《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1999）、《台灣史小事典》（2000）、《日據時期台灣儒學參考文獻》（2000）、《台灣文化事典》（2004）、《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2006）、《台灣文學年鑑》（1996開始編纂迄今）、《台灣作家作品目錄》（2007）等，我們在期待有更多「台灣學」工具書能陸續誕生的同時，也盼望有更多類似《台灣歷史辭典補正》的評論專書出現，可以讓這一學門的研究在不斷相互討論與辯難之際，而於質與量雙方面都持續昂揚與提升。

